

“回笼漂”现象中青年劳动价值观的冲突与调适研究^{*}

——基于结构二重性视角的考察

薛敏霞

(上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回笼漂”是指在大小城市之间反复流动的年轻人的一种生活工作方式,该现象折射出青年劳动价值观变化甚至冲突的现状。“回笼漂”过程中,青年劳动价值观存在着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矛盾、外部环境复杂性和自身能力局限性的冲突、个体追求与社会责任的权衡。结构二重性理论强调结构与行动之间的互构,能够考察青年劳动价值观的社会结构和自我建构的行动之间的关联机制。基于结构二重性视角的考察,在宏观场域治理、中观文化调节、微观主体引导中打通青年劳动互动空间、塑造青年精神世界是新时代青年劳动价值观调适的未来路向。

【关键词】“回笼漂”;劳动价值观;社会变迁;结构二重性

【中图分类号】C9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75(2023)06-0027-08

一、现象透析和问题提出

青年是社会传承和创新的主力军,流动是青年群体的特质。2023年4月,伴随着北青网一则《“回笼漂”:曾逃离北上广深的年轻人又回来了》的报道登上百度热搜榜,“回笼漂”一词成为新的网络热词,用以形容在大小城市之间反复流动的年轻人的生活工作方式,即一个人离开某城市(通常指北上广深)后,过段时间又返回该城市工作和生活。智联招聘联合泽平宏观发布的《中国城市95后人才吸引力排名:2022》显示:一线城市95后人才净流入占比为9.1%,远高于总体的5.4%,一线城市仍然是人才流动的首选^[1],有23%的人会在逃离北上广深15个月左右选择回归。青年是最富生气且更具行动力的群体,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分析青年劳动价值观状况,帮助青年确立安身立命的劳动价值观念,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关于青年的空间流动话题在网络空间和现实讨论中屡见不鲜,国内学界对于人口流动的分析讨论,从带有整体性的讨论转向对系统的分层考证,已有文献围绕青年大学生“空间流动”的研究呈现出两条解释进路。一是外部环境影响说。如有学者关注到制度结构、政策导向、区域发展、家庭支持、关系网络等影响青年的流动选择^[2-3]。二是个人特征说。如有学者认为青年职业心理、情感寄托、个体价值观、个人能力和特长等因素对青年空间流动产生重要的影响^[4-6]。总体来看,这些研究或是运用社会结构范式或是运用主体分析范式,为青年就业选择提供了相应的解释路径。

^{*}【收稿日期】2023-10-20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会重点课题“新时代青少年劳动观及其教育引导研究”(项目编号:2023A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薛敏霞(1995—),女,广东汕头人,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可以看出,青年流动关联到多重现实层次,以往的研究因为缺少综合性理论范式而显得过于简单。因此,应当考察青年流动现象的结构与行动之间的互构,打破行动与结构之间的二元对立,建立更为综合的理论范式来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一切发生变革的人类活动皆渗透着不断更新的文化形态^[7],价值观是影响和塑造行为的重要因素,人们行为的动机是受价值观的支配和制约的。同时,价值观作为个体相对稳定的认知和态度的体现,对个体的就业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促成青年流动的关键因素是他们劳动的内在动力,即人为什么要劳动,劳动能带给人什么价值,进而才是去哪里工作、选择什么样的工作等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比择业观、就业观更上位的概念——劳动价值观,即个体对劳动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劳动价值观是个体评判劳动标准、权衡劳动利弊得失的内在尺度。相关研究表明,青年的劳动价值观与其流动选择密切相关^[8]。当前青年的劳动价值观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正发生着历史性的嬗变,这不仅反映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更反映了青年自身的劳动认知和对未来的期许。青年“回笼漂”的选择呈现出了年轻人对于一线城市的复杂情感和态度,亦表明了年轻人内在的劳动价值观。因此,发掘青年在一线城市空间“再入场”的积极意义,就需要加强对青年劳动价值观的调适,促进青年认识到劳动对自身的意义和价值。这应该是保障青年未来发展的重要发力点。

青年是正在经历社会化的人,其劳动价值观并非一次就形成的,而是在个体生命历程的投射下不断被维系和创造的。结合青年“回笼漂”现象的结构范式和主体范式,“结构二重性”能够将个体的劳动价值观构建从社会结构的压制性以及心理式解读的晦暗性中解脱出来,赋予能动性的表现和清楚的实践含义。因此,本研究聚焦于结构二重性视角来分析青年“回笼漂”现象下劳动价值观的冲突与调适。需要说明的是,青年阶层流动的现实以及就业选择正确与否不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本研究意在通过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理论的微观视角探析青年流动行为的发生机制,形成对青年“回笼漂”现象的理解,并阐释青年劳动价值观的状况。因此,在对青年“回笼漂”现象的思考后,本研究采用“现象—理论—对策”的分析逻辑统贯整体思路,追溯青年流动行为和劳动价值观的关系,试图来解决以下问题:青年“回笼漂”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调适青年的劳动价值观,以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二、理论与视角:结构二重性的考察

吉登斯从涂尔干、孔德、韦伯的思想中汲取自身理论建构基础,在《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中提出了结构二重性理论。该理论指出,“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的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之中,‘内化于’人的活动”^[9]。从社会结构与个体劳动价值观来看,社会结构中的劳动分工、社会地位等因素会影响个人对劳动的态度和价值观念的形成,而个人的劳动经验和认知也会影响劳动分工和社会结构。同时,结构和行动双向的互动对于个体来说是“重新发现自我”与“自我检验和改造”的过程^[10]。“结构二重性”理论以行动者的反思性构成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先决条件,个体随着知识的不断增加以及在社会结构“抽离”及“再嵌入”过程中反思性运用的不断增强,形成更加科学和成熟的认识。在社会结构的制约下,个体运用个人的反思性和实践的能动性,并利用各种途径来应对微观个体的生活失衡困境,从而达到社会结构制约性与使动性的统一。

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青年意识的觉醒使得青年重新思考自我的意义和未来发展的方向。青年在应对社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会形成一种新的劳动价值观,这种劳动价值观反过来又会成为继续影响和形塑社会的动力因素。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的“结构”,并

不是外在于个人的，它对行动产生影响的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因此，作为行动主体的青年，其劳动价值观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公共政策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同时，青年的劳动价值观也可以建构社会关系并加强社会结构。青年的劳动价值观冲突是个体受到客观结构性约束和主观文化认知性因素的双重制约而形塑成的一种状态，如果不能得到较好的调适，会导致个体“存在的内部性”断裂，归属感再次流失。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理解，青年的劳动价值观状态在社会结构拉力和自身行动推力的作用下，包含着复杂而多样的内涵和特质，既受制于社会结构和关系的影响，也被行动者的认知行为和文化心理所建构。“回笼漂”虽然是现代性的社会境况施加在青年人身上的选择，但对于青年个体自我而言，它是一个主动干预和转型的过程。因此，可以发现，青年劳动价值观调适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具有一定的适切性。在“结构二重性”视角下，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将科学的劳动价值观整合进角色功能中，从而实现人与社会的均衡、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三、偏离与迷失：青年劳动价值观的主体冲突

从生命成长周期来看，青年正处于智力开发、才华施展阶段，青年劳动价值观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青年的空间流动，既是社会发展需求，也是青年试图应对现代性发展带来的压迫感所进行的相应的自我劳动空间的调适。

“回笼漂”一族在其热情被一线城市消磨殆尽之后，回到了貌似“岁月静好”的小城市，然后又再一次决定“杀回”自己曾经逃离过的大城市。本研究选取了北青网、北京青年报等主流媒体关于“回笼漂”的报道案例，以及豆瓣小组、知乎、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关于“回笼漂”的帖文作为观察样本，探讨年轻人在城市间切换的动机和经历，分析“回笼漂”一族劳动价值观的内在冲突。

从一定程度上说，“回笼漂”现象是青年空间流动连贯性的一种中断，一方面折射出当前社会竞争、经济发展、制度转型等宏观结构对能动个体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青年在一段时间内对自身生活处境的不确定性和对未来的迷茫以及在共时性中发生的价值冲突的自我偏差和游离。青年在生存价值和发展价值、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难以抉择和把握，这种冲突感在劳动价值观层面上主要表现为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矛盾、外部环境复杂性和自身能力局限性的冲突、个体追求与社会责任的权衡。

（一）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矛盾

时代的变迁、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复杂增生，让青年的价值观念充满了易变性和矛盾性。一些青年既面临着传统家庭期望和社会规范的压力，又希望追求个性化、开放性的现代职业道路，导致他们在劳动价值观上出现一些冲突。也就是说，青年劳动价值观在受到父辈和世俗观念影响的同时，经济的发展、就业机会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等宏观结构也影响着年轻人对劳动的看法，深刻地形塑着青年的劳动价值观。青年一方面没有从传统的观念中彻底解脱出来，另一方面在时代洪流推动下又产生了新的劳动意识。

根据北青网的报道，选择回到老家的“茜茜”发现，身边人似乎更关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不是社会新闻和公共议题，身边难觅相同价值观的人。让她难以忍受的是小城市缺乏包容度和自由度。茜茜发现，“家乡人对大龄女生的包容度是很低的。在他们眼里，到了年纪不结婚，没生孩子，似乎是天大的不是”。一次，茜茜去医院体检，一位医生在得知她30岁还没生孩子之后，一脸惊讶^[1]。我们可以发现，在许多青年眼中，县城就是一个陌生的熟人社会，年轻人离开县城，其实一个原因就是离开这种“以人情关系网编织的封闭又紧凑的樊笼”。对于茜茜而言，无法再融入老家的生活和圈子，那个故乡，已经变成了“回不去的故乡”。

在传统价值观中,根植于历史、文化的一套信念是,正经的工作就是公务员、医生、老师等看起来体面的工作,而其他工作被统称为没前途、干不长、不正经。家长希望子女能够获得经济稳定和安全感,这种执念往往导致他们要求子女选择一些被认为是“铁饭碗”的职业。但是这些体面的工作毕竟“一位难求”,这是年轻人不得不逃离县城的主要原因。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现代家庭趋于小型化,经济支撑功能日益弱化,家庭成员之间经济依赖度降低,尤其是走出县城后,成年子女往往能保持经济独立,追求自由生活和私密空间。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职业选择的标准在逐渐改变,现代社会对创新创业和个人发展的需求越来越高,青年对自由、个人权利和自我实现的追求增强,仅仅追求稳定可能无法满足年轻人的职业发展需求,更多青年希望寻找富有灵活性的工作。一线城市以发展机会和创新优势吸引青年流入,青年越来越多地选择各种“去传统化”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通过就业实现向发达城市的流动,是多数青年的人生理想。

在传统与现代劳动价值观的交融和碰撞中,在“退隐”和“漂”的拉扯中,青年劳动价值观自塑与他塑的偏离、落差,难免让青年的心灵世界充满矛盾与痛苦。“城里待不住,村里回不去”“卷不动也躺不平”“一线城市放不下肉身,小县城放不下灵魂”“高不成,低不就”的语言景观映射出了青年的选择焦虑和劳动价值观的困顿。在这种境况下,部分青年即使选择“回笼漂”,也不但再难找到生活的平衡感,反而会加剧对个人命运和前途的迷茫,很可能再次成为大城市的边缘性弱势群体。

(二) 外部环境复杂性和自身能力局限性的冲突

对于北上广深一线城市,青年形成了“既爱又厌,既想拥有又想远离”的矛盾心理,欲望与现实在青年身上撕扯和角逐。外部环境和个体自我诸多因素成为青年留在一线城市的阻碍。一开始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强子”就失望地发现,工作内容、待遇等和聘用合同上的完全不符,再加上身边同事全是研究生学历,无形中给强子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两个月后,强子的第一次北漂以“逃离”告终。但回到家乡的强子发现了大城市的优势,还是再次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豆瓣网友“乐马斯”表示:“虽然一线城市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等我们真的逃离它的时候,意识到有些东西有些习惯无法适应和改变,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地面临十字路口,是原地不动,还是倒回或踏出一步?”^[12]

对于来自非一线城市的青年来说,适应一线城市的生活和文化环境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挑战 and 负担。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不稳定的经济形势、高昂的生活成本等复杂的外部因素可能使青年感到压力重重,难以实现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未来期望,青年面临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困惑。

一方面,青年个性化价值主张、多元化人生追求在现代社会不断得到彰显;另一方面,青年个人能力也面临着局限性。刚毕业的青年大学生可能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和专业技能,市场竞争力不足。同时,由于青年的职业规划和目标还不够清晰,缺乏对自身兴趣和能力的深入了解,导致青年在选择和适应职业道路时感到困惑和迷茫,在“逃离”与“重回”之间经历希望和失望。“一线城市工作”被视为一种符号和标签,在普通家庭的大学生的观念中,“退回去”意味着人生失败,而“去北上广深”则代表着世俗意义上的出人头地。在从众效应推动下,“宁可失业,不回老家”“年轻人的人生去处是大城市”“只有在大城市才能实现人生的理想”的“向上”欲望和摆脱底层的心态,助推了“内卷”文化,这些都会导致青年的劳动价值认识偏差、价值取向畸变。当代青年有勇气追寻更加自主、有意义、富有成就感的理想生活方式,不满足于固守传统劳动模式。然而,这种乐观想象一旦遭遇现实的无情打击,又会反过来从根本上动摇青年关于个人发展的信心和预期,削弱青年的主体性,威胁到其自我认同的连贯性。青年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难以正确认知新时代赋予劳动精神的新内涵。当青年群体不能正视主体悖论,而“辗转”于多个空间,并非

出于自身对劳动价值的追求时，在这种切换、兜转、继续“漂”的过程中，焦虑不安感日益加剧。

（三）个体追求与社会责任的权衡

传统劳动观教育强调社会取向，中国文化历来重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把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视为评价个人价值的首要标准，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出现矛盾时，提倡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集体主义时代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个人的劳动常常被赋予了很多社会取向，提倡“舍小家为大家”的工作伦理。

在关于“数据显示超两成人逃离北上广深 15 个月后回归，如何看待一线城市回笼漂？”^[13]问题上，知乎网友“黄欣伟”回答道：“并非马后炮，回笼漂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北上广深的压力大、成本高，很多人觉得自己的辛苦都在为房东打工，所以选择逃回故乡。但事实上，因为城市发展的分化，‘大城市病’在故乡无处可寻的背后，也伴随着机会少、配套差、竞争不透明和不公平。所以，对普通家庭出身的人而言，大城市还是首选，自己的汗水看得见。”

“吴悦”因为疫情从北京回到家乡，虽然回老家工作的这两年，亲戚们对吴悦的评价是稳定、体面、听话，可是家乡的资源、人际关系的“边界感”等等，让吴悦并没有过得那么开心，她决定重新成为北漂。然而，找工作并不顺利，在北京失业半年差不多花光了自己的积蓄。有一天，吴悦爸爸的突然打来电话，第一句就问她打算什么时候回来，不等吴悦解释，吴悦爸爸便发来这样一段话，“我年纪这么大了还能养你几年？还能指望你养我吗？为什么你一点责任感也没有？”^[14]

在现代社会，随着自我意识分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当代青年呈现出“自我经营主体”的表征，他们渴望在职业生涯中发展自己的技能、追求个人兴趣和激发潜能，希望通过工作实现自我认同、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当前青年劳动价值观更加重视个人价值、权利和利益，倾向于个人的选择和生活方式的个体化，主体意识得到普遍增强。在“为自己而活”思想观念的指引下，以自我实现为奋斗动力。然而，中国社会的人生活在“差序格局”之中，既是以自我为波纹的中心圆点，同时，又从属于以他人为中心的波纹圈子。青年阶段是个体社会地位序列和角色序列转变和发展的过渡阶段，青年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日益增多，青年的劳动往往关注他人的福祉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个体追求和社会责任的冲突让青年陷入忧郁和不确定的状态，他们总在试图找到更好的平衡。他们担心，如果选择了过于强调个人兴趣、价值和观念的职业，就无法获得他人的认可；如果过于关注社会责任，则可能失去自己的个人发展的机会。在这种矛盾中，青年要么脱离社会寻找自我，出现偏执和走极端的现象；要么放弃自我追求，完全迎合社会、家人、朋友的期待，扭曲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在从众效应下忽视个人内心的声音，过于追求他者的认可而作出妥协。质言之，青年自身追求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张力致使青年内心充满了对抗感与拉扯感，生命成长呈现出弥散性和断裂化状态。

四、回归与超越：结构二重性视角下青年劳动价值观冲突的调适

青年不仅是接受规范的被动参与者，更是社会化过程的积极推动者。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满怀理想的青年劳动价值观念的变迁和冲突。“回笼漂”不仅杂糅了青年的迷茫、纠结等心理状态，也指涉了当代青年在时代转型中的劳动价值观冲突。青年的劳动价值观冲突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境遇，化解青年的劳动价值观冲突，从结构二重性视角看，由于个体的认知系统受到主体和外界环境二重因素影响，需要通过微观引导、中观调节、宏观治理，有效激活、优化、强化青年正确的劳动价值观，积极引导青年在自我定位中勇担时代使命。

（一）微观主体引导：激活青年劳动价值观调适的原动力

微观主体引导涉及主体意义制定，是将新的经验整合进原有经验的过程。青年的劳动价值观

冲突在现代社会尤为普遍,是青年努力寻找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的呈现,也是青年与现代性社会相互映射关系的动态性过程。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和全球化的影响,青年面临着多样的价值取向,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可能由于缺少足够的机会去深入了解自己的兴趣和潜力,而被迫去追求社会所规定的“成功”,这些新的不确定性会引起青年劳动价值观的冲突感,让他们感到迷茫和不知所措。因此,从微观个体维度层面上看,劳动价值观调适的重点是看到青年自身的能动性,激活青年内在原动力,使其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和职业环境,走出个体迷失局面。首先,要引导青年进行自我反思。自我反思,就是自我反省、自我检查,能“自知其短”,从而弥补短处,纠正过失。青年善于接受新事物,乐于追求高品质生活方式以及新型劳动,且擅长构建自我生活空间。传统社会中,青年的自我同一性形成机制主要是由外部社会环境因素所导致的结果,所依据的标准是明确的、恒定的;而在现代社会,青年的自我同一性形成机制则逐渐变成了个体内部因素进行的选择和确证,所依据的标准是模糊的、易变的^[15]。通过引导和启动青年自我反思,审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明晰自身的身份定位,以破除“被虚假欲望挟持的自我、被现实状况压抑的自我、被理想形象宰制的自我、被权力空间规训的自我”^[16],找到真正符合自己发展需求的职业道路。在自我反思和探索中,青年劳动主体能够建立更加明确有意义的职业目标,从而更有动力朝着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前进。内心需求和职业选择的契合,有助于使个人在劳动过程中获得满足感、幸福感、价值感。其次,要引导青年设定个人目标。目标的设定可以帮助青年明确他们在生活和职业上的方向,有助于他们更加专注于追求与目标一致的工作机会,避免在不符合内心目标的职业领域上浪费时间和精力。设定目标也能为青年提供一个自我反省和自我发展的机会,从而建立更为成熟的更具适应性的劳动价值观。当青年开始意识到自身劳动与社会相互联结且相互作用的部分,并据此采取行动时,就会承担起自身选择所带来的责任,对自己的行动负责。这意味着,青年通过不断的自我反思建构着劳动立身、奋斗幸福的实践价值,重建劳动的意义解释系统,推动着自身的劳动实践性向度的发展,能够形成正向循环,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二) 中观文化调节: 优化青年劳动价值观调适的内生力

青年亚文化是青年群体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念、利益诉求而构建的、表达自我的一种文化实践,为青年提供了一种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和生活方式,越来越成为年轻人寻求身份认同的新坐标和新参照。以价值认同为连接的青年亚文化“圈层”进行的是更加自主、更加开放地寻求自我、表达自我、创造自我的种种探索,突出的是“自我的彰显”,强调的是个人成长、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青年亚文化的多样性为青年劳动价值观调适提供了宝贵思路。据此,可以挖掘并激发青年亚文化潜在的精神生产能量,切实关怀青年群体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实现对青年劳动价值观的调适。首先,要创造共鸣。充分利用青年亚文化对青年的吸引、凝聚和建构功能,探索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中的相通之处,结合新现象、新事物,根据青年的鲜明特点创造价值共鸣,这样才能走入青年的内心世界,充分理解青年的关切和需求,帮助青年缓解其“存在性焦虑”。在发现青年劳动价值观陷入浅表化、平庸化和世俗化时,教育者要用主流价值体系为青年补充精神养料,并及时增添现代青年喜闻乐见的新元素,增强主导价值的表现力和传播力,将主流劳动价值观念转化为青年劳动观教育的有效资源,完成对青年新的、有益的劳动价值观建构,提升青年劳动的能动性、创造力和多样性。其次,要丰富创新劳动文化体系。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劳动者从产生劳动认知、形成劳动方式、从事劳动活动到处理劳动关系,都与劳动文化的滋养息息相关。青年亚文化能够为新时代劳动文化体系建设增添活力,我们可以汲取青年亚文化中的文化格调、文化样貌等创新元素来丰富新时代的劳动文化样态,如充分利用媒介进行社会关系的联结,帮助青年群体将自身嵌入到社会劳动中并找到自身的位置,完成自身的劳动身份调适。也就是说,在作为社会劳动文化价值支撑的劳动精神转化为青年的个体劳动精神的过程中,具有象征性的青

年亚文化成为了有效的中介环节，提高青年对劳动的价值认知，推动社会“劳动精神”的个体化转向，帮助青年看到自身的劳动价值，并在劳动中开创美好未来。

（三）宏观场域治理：强化青年劳动价值观调适的外推力

布尔迪厄认为，“场域”是各种推动力量下形成的各种客观的社会关系交织而成的关系空间，整个社会“大场域”是一个由若干个高度分化、相对自主的经济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等“子场域”构成，大场域和每个子场域都拥有各自特有的价值观^[17]。从宏观视角来反思青年劳动的关系空间，青年劳动价值观调适需要场域的支持。宏观场域的政策执行、社会支持、组织运行直接影响青年作为行为主体参与场域劳动的成效。首先，打破地域壁垒是关键环节。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不应该“城市的归城市，农村的归农村”，而应该实现良性互动、双向流动，让农村青年在大城市建功立业，也让城市青年到农村寻找梦想。国家层面颁布的政策对青年流动具有引领、管理的功能，政府可以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在制度的政策上尽可能向弱势群体倾斜，鼓励和支持农村青年到城市就业创业，提供相应的补贴、优惠和就业机会，为其劳动技能水平提升创造条件；同时也为有能力的城市青年到农村发展提供平台，将其培养成为乡村发展的中坚力量。其次，对地缘空间的扩展综合利用。需要认识到，我国非一线城市仍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提升非一线城市的吸引力是缓解青年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出路。目前，提高非一线城市的吸引力在我国仍处于宏观层面的治理阶段，与产业升级同步的路径选择，涉及科学认知、资源分配、运转效率的实施，可将优质的产业等资源引入，优化内部运作，为青年提供更多机会和发展空间，保证其可及性及公平性发展，激励更多青年在此地实现自己的职业梦想。最后，形成多场域关联互动关系。地方政府、社会与家庭场域要打通时间维度关联，拓展多样地缘空间，增强内部关联性、生成性和整体性。家校社要积极更新劳动观念，发挥各自场域的效用，并在整体上产生互动，以最大程度提供支持力量，保障青年的主体性，满足青年在创造性和创新性劳动方面的主体需求和劳动适应。

总之，不同场域的交互作用是青年劳动价值观调适的外推力，有助于帮助青年理性审视劳动的意义和价值，坚定正确的劳动价值取向，在劳动价值观的连贯、断裂、重构中形成稳定的、科学的劳动认知、劳动思想和劳动行为。

五、结语

康德的理性启蒙要求“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18]，认为运用自身理性作出明智的决定是主体性的核心特征和体现。青年的劳动价值观很大程度上规定了青年在未来发展能达到的境界。“回笼漂”现象是社会变迁、个体继续社会化与向上流动需求多种原因共同促成的“产物”，折射出社会结构对青年的压力，也映射出青年劳动价值观内在张力及冲突，既包含着青年对安全感的寻求，也有“自我觉醒”的意味。从发展意义上看，价值实现、精神享受是人类的发展需要，劳动价值观的冲突问题既是个人发展问题，也是社会发展问题。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生发劳动期待和信仰，对自我身份和生活意义产生一定想象，期待通过重构一个生存和发展空间，来实现对生活 and 生命意义的积极建构。青年的劳动价值观冲突是个体受到客观结构性约束和主观文化认知性因素的双重制约而形塑成的一种状态。因此，厘清青年劳动价值观冲突的表现形式，通过微观主体引导、中观文化调节、宏观场域治理，建构、激活、优化青年的科学劳动价值观，有助于促使青年在与外在社会结构制约或限制相互博弈中完成内在价值世界的自我确证，帮助青年更好地探索自我发展路径，更好地投身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事业。

[参考文献]

- [1] 王雪儿. 重回一线城市, 一些年轻人“回笼漂” [N]. 中国青年报, 2023-04-11(07).
- [2] 窦旺胜, 秦波, 郝美竹, 等. 中国青年流动人口城市选择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 [J]. 地理研究, 2023(5): 1234.
- [3] 魏淑媛. 流动的反思性: 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高学历青年的城际流动实践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1(1): 71.
- [4] 丁京. 从“离土”到“入乡”: 农村青年精英反向流动的空间逻辑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8): 76.
- [5] 安真真. 流动的家: 城市青年的住房选择与自我认同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4): 63.
- [6] 于艳红, 杨鹏飞. 青年科技人才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J]. 产业创新研究, 2022(11): 156.
- [7] 雷洪, 赵晓歌. “城归”现象: 主体特征、形成机理与生成逻辑 [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4): 5.
- [8] 刘曦, 李珂. 青少年劳动价值观内化机制探析 [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6): 178.
- [9] 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大纲 [M]. 李康, 李猛,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89.
- [10] 邢媛. 吉登斯的现代性自我认同品格思想研究 [J]. 哲学分析, 2021(1): 140.
- [11] “回笼漂”: 曾逃离北上广深的年轻人又回来了 [EB/OL]. (2023-04-18)[2023-09-28].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3513065046918773&wfr=spider&for=pc>.
- [12] 乐马斯. 逃回一线城市 [EB/OL]. (2023-04-19)[2023-09-28]. <https://www.douban.com/group/737248/>.
- [13] 嘉玛. 数据显示超两成人逃离北上广深 15 个月后回归, 如何看待一线城市回笼漂? [EB/OL]. (2023-04-13)[2023-09-28].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94939544/answer/2990782003>.
- [14] 重返北京的年轻人: 宁可失业, 不回老家 [EB/OL]. (2023-04-19)[2023-09-28]. <https://m.163.com/exclusive/article/I4PL5AJ0000199ET.html>.
- [15] 沈杰, 陈玉真. 当今青年多重边际人角色困境与超越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3(6): 38.
- [16] 樊小玲, 陈祉睿, 邓颜. 断裂与重构: 现代性背景下青年的自我指称与身份认同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3(7): 39.
- [17] 包存宽. 基于场域优化管控的风险治理新范式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3(2): 83.
- [18] 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M]. 何兆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24.

The Conflicts and Adaptation of Youth Labor Values in the "Floating Back" Phenomenon

— A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Dualism

XUE Minxia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Abstract: The word "floating back" refers to a lifestyle of young people who repeatedly move between large and small cities, reflecting the changing and conflicting state of youth labor values. In the process of "floating back", conflicts arise between traditional values and modern values, between the complexity of external environment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individual capabilities, as well as between the balance of individual pursuit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he theory of structural dualism emphasiz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structure and agency and can explore the mechanisms linking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youth labor values and self-construction actions. Based on the examination from a structural dualism perspective, opening up spaces for youth labor interactions, shaping the youth's spiritual world through macro-level governance, meso-level cultural regulation, and micro-level guidance would be the future direction for adapting the youth labor value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floating back"; labor values; social changes; structural dualism

[责任编辑: 邵慧萍]